

新名詞之戰： 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

黃克武**

摘要

清末大量的日譯新名詞(亦稱「東語」、「和製漢語」)隨著翻譯書刊傳入中國,造成重大的文化衝擊。面對日譯新名詞的入侵,中國的官員、學者與學生,例如張之洞、嚴復、林紓、章炳麟、彭文祖等人,都對之大加批判。其中翻譯大師嚴復尤其努力地鑄造新詞或修改和製漢語以為肆應。這一場競爭從清末延續到民初,至1920年代勝負已判,日譯新名詞可謂得勝。本文描寫嚴復譯語與日譯新名詞對抗的過程,而以1903年出版的《新爾雅》到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作為考察指標;《新爾雅》中仍收錄不少嚴復譯語,然至《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日譯新名詞則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文中討論的嚴譯詞彙包括:音譯的翻譯語,如「拓都」與「么匪」、「涅伏」、「邏輯」、「烏託邦」等;義譯的翻譯語,如「官品」、「部勒」、「群學」、「名學」、「天直」、「民直」等。這些嚴譯詞彙幾乎都不敵日譯新名詞。嚴譯的失敗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編訂名詞館」,在名詞統一工作上成效不彰。清末新名詞之戰顯示荀子所說的「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一語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嚴譯詞彙有不少「善名」,遺憾的是在各種因素影響下,終未能「約定俗成」;儘管如此,它們卻具體地揭示了翻譯的標準,足資借鑒。

關鍵詞：和製漢語、張之洞、新名詞、編訂名詞館、嚴復

* 收稿日期：2008年6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11月6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 言

1909年（宣統元年）在上海由沈知方與王均卿主持的國學扶輪社出版了一本林紓(1852-1924)與嚴復(1854-1921)作品的選輯，名為《林嚴合鈔》。在序文中編者表示：「甚矣，文之難言也。夫己氏以攙合東語，雜湊成篇之文字，倡導學子，而後進承風，摹倣不已，至沿襲其膚淺語、率易語而奉為金科玉律。謬種流傳，校風漸染，此亦時文後之一厄也」，接著則說「林、嚴兩先生起而正之」，此乃編者選輯、出版兩人文章的主要原因。¹這一篇序文凸顯了清末嚴復、林紓等人之翻譯文字與「東語」（意指受到日譯新名詞影響之語彙與文字，亦稱「和製漢語」）之間的競爭狀態。

這一場競爭從清末延續到民初，大致上到了1910、1920年代，勝負已判，「東語」可謂得勝。在1903年汪榮寶(1877-1933)、葉瀾(1875-?)編輯《新爾雅》之時，雖以日譯詞語為主，但書中卻蒐羅了不少嚴復的譯詞，然至1910年代以後所出版的類似書刊，如黃摩西主編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之中，嚴譯詞彙則屈指可數。²1925年，在文字立場上較支持嚴復的柴小梵(1893-?)，出版了《梵天廬叢錄》，其中有一段記載清楚地表達出「嚴復陣營」對於「倭文……流行於禹域」的無奈：

蓋新學者不能讀古書，而老生又不解西籍，二者交讎，而倭文乃流行於禹域。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謂日文勢力，及於中華，頗譏吾人摹擬無識，吾人能不愧乎？及至梁啟超掌法部，乃改「取銷」為「撤銷」，「手續」為「程序」，「目的」為「鵠的」，然大勢所趨，不

¹ 曄曄子，〈林嚴合鈔序〉，《林嚴合鈔》（上海：國學扶輪社，1909），頁1。

² 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上海：明權社，1903）。在該書中嚴復所用的「計學」、「群學」、「名學」都被保存下來，與「經濟學」、「社會學」、「論理學」並列。在名學部份，嚴復譯詞保存得尤其多，如「公名」、「專名」、「總名」、「散名」、「察名」、「玄名」、「正名」、「負名」都是嚴復在翻譯《穆勒名學》時所使用的詞彙，見《新爾雅》，頁76。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

可挽救。學者非用新詞，幾不能開口動筆，不待妄人主張白話，而中國語文已大變矣。³

從日本傳來的新名詞在近代中國所引起的「大變」，曾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較早的一個研究可能是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最近的研究則有沈國威、王中江、劉禾(Lydia H. Liu)、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羅志田、黃興濤和馮天瑜等人編寫的作品。⁴這些文章顯示在清末無論是官員、學者或留日學生，例如張之洞(1837-1909)、章炳麟(1869-1936)、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作者)，以及上文所說的嚴復與林紓等人，都對「東語」乃至更廣泛的「東學」大加批判；然而，儘管有這些責難，日譯新名詞仍大量地融入中國語文之內。論者以為它們成爲漢語外來詞彙中「主要來源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大的來源」，而且這些詞彙的流行「不僅使漢語的詞彙更加豐富」，同時也爲科學技術輸入中國，帶來很大的便利。⁵此一論斷應無疑義。

³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1033。服部宇之吉(1867-1939)爲日本的中國學家，精研儒家思想、宣揚孔教，著有《心理學講義》、《儒教與現代思潮》等，1902年至1909年曾任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總教習。柴小梵對梁任公抱持著批判的態度，他認爲東語之流行與任公之文字及其所辦的雜誌關係密切，晚年雖有所彌補，然始作俑者，罪不可逭。有關梁啟超對中日詞彙交流所起的作用，請參考李運博，《中日近代詞彙的交流——梁啟超的作用與影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作者指出至少有141個日本借用語，是因爲梁啟超的關係而流行於中國，見頁241。

⁴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沈國威的研究非常豐富，如《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東京：笠間書院，1994)；〈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241-270；沈國威編，《漢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神戶：關西大學出版部，2008)。王中江，〈中日文化關係的一個側面——從嚴譯術語到日譯術語的轉換及其緣由〉，《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頁141-154。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羅志田，〈抵制東瀛文體：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57-74。黃興濤的作品如〈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於「一般思想史」之認識〉，《開放時代》，2003年第4期，頁70-82。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馮天瑜、劉建輝、聶長順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⁵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237-238。

清末國人對日譯新名詞的批判與抗拒，最後幾乎全軍覆沒，沒有留下太多的遺跡。熊月之在討論西學東漸時，曾對嚴復譯語的命運做過一個統計，他說「嚴復冥思苦索、刻意創立的名詞，……絕大多數都競爭不過從日本轉譯的新名詞。……商務印書館在嚴譯名著八種後附《中西譯名表》，共收詞 482 條，經考察，其中被學術界沿用的只有 56 條（包括嚴復沿用以前的譯名如『歌白尼』、『美利堅』等），佔不到 12%。」⁶這一個統計其實不足以反映嚴譯名詞之困境，因為該譯名表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部在 1930 年代所做的，不但不經意地剔除了許多已融入中文的日譯新名詞，對於嚴復所自創的一些譯語也未摘出，甚至錯誤不少，以致不能完全反映詞彙融合與競爭的複雜面貌。

嚴譯的失敗原因究竟為何？根據學者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一、清末以來譯自日本的書刊數量太多，形成一整套系統，這些書刊不但壟斷了出版界，也包括了上游字、下游字貫穿為一的語言體系，這些日本語彙在人們約定俗成之後，即難以抗拒。相對來說，嚴譯書刊只在市場上佔一小部份，同時嚴復又未能積極經營報業，因而在影響力上有所侷限。二、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不易為人理解，以致在五、四白話文運動後很難受到人們的歡迎。三、嚴復翻譯好用單音詞（如計學、群學、心學；又如以「聯」來翻譯 corporation、以「貨」來翻譯 commodity），不敵「複合詞」（如經濟、社會、心理、法人、商品）在意義傳遞上的豐富性。四、嚴復喜用音譯。五、嚴復所負責之譯名統一工作遲遲無法有效推行等。這些原因大致說明了「名詞戰爭」結果所導致的語彙消長。然而嚴復等人所創造的中譯語詞究竟如何對抗日本翻譯語，並導致落敗？同時這些雖經「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冥思苦索，刻意創立」，最終卻遭遺忘與淘汰的譯語是否真的全無影響，且在翻譯上不具價值？這些議題仍值得反省與檢討。⁷

⁶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700-701。

⁷ Joshua Fogel 早在 1993 年就指出這一課題值得探究，轉引自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p. 390.

二、從「名詞」談起

在討論嚴復翻譯所面臨的困境之前，首先必須注意，在 1895 年甲午戰敗後，嚴復開始從事翻譯工作之時，日譯名詞已經透過梁啟超(1873-1929)與其他大量留日學生的翻譯著作，以及日本人的漢文作品與報刊翻譯文字（如《時務報》的日籍譯者古城貞吉），⁸大規模地進入中文。許多觀念如不用日譯詞彙幾乎就無法傳達意旨。有關張之洞的幾則小故事十分傳神。第一則故事是出自張達驥、李石孫的〈張之洞事蹟述聞〉。該書記載張之洞有一個學生要去外國出差，臨行前往拜見。張之洞問他何時啓程？他答說：辦完出國「手續」就走。⁹張之洞聞之不悅，說：「以後不要用這類新名詞。」該生笑曰：「『新名詞』三個字也是『新名詞』。」¹⁰此外還有幾則類似的故事。據江庸(1875-1960)的《趨庭隨筆》記載，光緒末年，張之洞任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想要抵制日本名詞在中國氾濫，因此張氏對部屬奏疏公牘中 useful 新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云：『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¹¹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中亦記載：「張文襄公深惡新詞，至因此譴責幕僚，然其官牘，亦不能盡廢。」該書還舉了一個端方(1861-1911)用「新名詞」來批評別人使用太多新名詞的例子：「若端方批某生課卷，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用新名詞太多，人傳為笑。」¹²

這幾則故事顯示日譯名詞的使用已經到了難以避免的程度。現今「名詞」

⁸ 見沈國威，〈關於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錄》〉，《或問》，2004 年第 8 號，頁 155-160。古城貞吉在《時務報》的「東文報譯」所翻譯的文字超過 40 萬字。

⁹ 「手續」源自日語「手續」。在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中，對此有所解釋：「手續者，經歷一定方法之謂。」（頁 22）

¹⁰ 張達驥、李石孫，〈張之洞事蹟述聞〉，《文史資料精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冊 1，頁 242。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中也有一個有關張之洞的笑話，張表示討厭日本名詞，該屬員的回答則是：「回大師，名詞兩字，也是日本名詞呀！」見頁 200。

¹¹ 江庸，《趨庭隨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124。

¹²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頁 1033。

一語，其實有兩種涵義：一是指詞彙、術語（英文的 term），一是指文法中表示人、事、物名稱之詞（英文的 noun）。¹³兩者之意義有部份重疊，然當時新名詞中的「名詞」顯然較接近英文中的 term。這兩種「名詞」的用法在傳統文獻之中都不曾出現，例如清中葉以來所編輯的各種《經世文編》即均未使用此一詞彙。1902年梁啟超在撰寫〈新史學〉與〈生計學說沿革小史〉時，大概是最早使用意指英文 term 一語的「名詞」者。¹⁴此語彙確為清末時新出現的詞彙，然該詞是否直接受到日本影響，則仍須探究。因為日文中「名詞」乃指文法中的 noun，而非 term，後者在日文之中是採用「言葉」、「術語」、「翻譯語」中的「語」等。我遍查日本國會圖書館明治時代的書目，「名詞」一語幾乎都是出現在文法書之中，並無梁啟超所使用的方式，這樣一來很可能是梁啟超將 noun 的「名詞」延伸至 term 的「名詞」。無論如何，至1902年以後「名詞」、「新名詞」二語在中文世界變得很普遍。

其實早在「名詞」二字普遍之前，新名詞已隨著《時務報》(1896-1898)、《湘報》(1898)等維新報刊的出現，而大量傳入中國，並引發了人們有關詞彙使用上的爭議。戰火從上海出版界中嚴復與梁啟超文字上的對抗，延燒到湖南

¹³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近現代漢語新詞源辭典》（香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頁174、236。在中文世界以「名詞」來翻譯文法中的 noun 是較晚才出現的。清末的書刊之中，如1879年曾紀澤的《出使英法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據清光緒17年(1891)上海著易堂鉛印本，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2006），以「實字」來表述此一概念，「實字天地日月之類是也」，見頁343-344。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是以「名字」、「名」來翻譯 noun，他說：「凡實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省約名。」（頁4）1904年嚴復所出版的《英文漢詁》（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是以「名物」來翻譯 noun（見該書目錄）。至1903年的《新爾雅》與1907年章士釗編的《中等國文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則開始採用「名詞」來說明文法中的 noun。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中對各種名詞加以解釋，包括：普通名詞、單獨名詞、合體名詞、個體名詞、具體名詞、抽象名詞、積極名詞、消極名詞、絕對名詞、相對名詞等（頁76）。章士釗編《中等國文典》中則說「名詞者，識別一切事物名稱之詞也。天地間之事物物，不論有形無形，舉凡接吾目而能知其名，應吾口而能舉其名，觸吾思而能憶其名者，皆名詞。」（頁4）總之，在二十世紀初期之後以「名詞」來翻譯英文的 noun 才逐漸變得很普遍。

¹⁴ 〈新史學〉中任公說：「所界、能界，所能二字佛典譯語，常用為名詞。」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書局，1978），卷9，頁10。〈生計學說沿革小史〉中則說：「《原富》……所用名詞，又多為尋常書籍所罕見。」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12，頁1。

新政中的新舊之爭。柴小梵指出：

向者侯官嚴復譯書，務為高古，圖騰、宗法、拓都、么匿，其詞雅馴，幾如讀周秦古書。新會梁啟超主上海《時務報》，著〈變法通義〉，初尚有意為文，其後遂昌言以太、腦筋、中心、起點。《湘報》繼起，瀏陽唐才常、譚嗣同和之，……湖南則自江標、徐仁鑄號為開新，繼以陽湖張鶴齡總理學務，好以新詞形於官牘。¹⁵

對於上述報紙、官牘之中新詞日益普遍的情況，湖南舊派的領袖王先謙(1842-1917)深感憂慮。他在 1898 年寫給陳寶箴(1831-1900, 1895-1898 任湖南巡撫)的信中指出這些新詞彙不合「古文之學」，並要求「釐正文體，講求義法」，以正觀聽：

自時務館開，遂至文不成體，如腦筋、起點、壓、愛、熱、漲、抵、阻諸力，及支那、黃種、四萬萬人等字，紛綸滿紙，塵起污人。我公夙精古文之學，當不謂然。今奉旨改試策論，適當釐正文體，講求義法之時。若報館刊載之文，仍復泥沙眯目，人將以為我公好尚在茲，觀聽淆亂，於立教勸學之道，未免相妨。¹⁶

同屬舊派的葉德輝(1864-1927)也抱持著類似的意見。他在〈長興學記駁義〉〔寫於 1898 年(光緒 24 年)7 月〕中批評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與徐仁鑄(1863-1900)等人對於「詞章」的看法。他說：

自梁啟超、徐勤、歐榘甲主持《時務報》、《知新報》，而異學之詖詞、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省之文風，日趨於詭僻，不得謂之詞章。¹⁷

王先謙與葉德輝所指出「礙眼」的新詞彙十分類似，或許透露兩人對此一議題曾交換意見，而相互影響。

¹⁵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頁 1032。

¹⁶ 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 1805-1806。

¹⁷ 葉德輝，〈葉吏部長興學記駁義〉，收入〔清〕蘇輿編，《翼教叢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頁 216。文中所提及「愛力」一詞應該是指汪康年於 1896 年在《時務報》第 12 冊發表的〈以愛力轉國運說〉一文中所用的詞彙。

上述的爭論並未隨著戊戌變法之落幕而結束，在康、梁流亡海外之後，反而變得更為激烈。尤其是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與留日學生所編譯的書刊如《游學譯編》等風行學界之後，新詞彙日益普遍。梁任公引進新詞彙和他的「新民」思想密切相關。對他而言，隨著社會的變遷，「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累積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此後「新新相引」，社會就會一天天地進步。¹⁸在梁任公的鼓動下，新名詞甚至進入考場的試卷與官員的奏摺之中。黃遵憲在1903年底寫給梁啟超的一封信，即指出在任公的影響之下，「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對新名詞趨之若鶩：

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勦襲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變矣。實事吾不知，議論既大變矣。¹⁹

上述的狀況造成了一些反對人士的不滿。1903年，由張之洞與張百熙所主導的〈新訂學務綱要〉，規定各學堂「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並大力抨擊「其與中國文字不宜者」，尤其是那些不出自中國古籍的各種日本「通用名詞」，認為它們或是「欠雅馴」或是「迂曲難曉」，甚不恰當。該綱要更表示「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係邪僻之士。文體既壞，士風因之」，將新名詞與使用者道德敗壞聯繫在一起，因而主張禁用不雅馴之新名詞。²⁰該文刊出之後，當時在京師大學堂教授心理學的日本教師服部宇之吉，以低調的方式在他所編寫的講義中提出異議。他認為不應以「雅馴」為標準來評估新名詞，因為所謂的不雅馴，其實是不習慣。同時他也指出禁用新名詞會阻礙新知識的傳入，結果將是得不償失：

奏定學堂章程有不許用新語之不雅馴者一條，然學術欲隨時而進步，學者隨事而創作新語，亦勢所不得免也。……玄奘等所創作之語，在當時未必皆雅馴，而今人則不復問其雅馴與否。由是觀之，語之雅馴

¹⁸ 梁啟超，《新民說》（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頁57。

¹⁹ 黃遵憲，〈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新民叢報》，1903年第24號，頁45-46。

²⁰ 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中〈新定學務綱要〉，引文見《東方雜誌》，卷1期3(1904)，頁64。

與否，畢竟不過慣與不慣而已。今中國正當廣求知識於外國之時，而敢問語之雅馴或因此致阻礙學術之發達，則豈能免顛倒本末輕重之譏乎？²¹

服部宇之吉因為教授心理學，有許多語彙「無可代用」，所以不得不使用「日本學界常用之語」。這很可能是當時不少新學教師所共同面臨的難題。他所謂「語之雅馴與否，畢竟不過慣與不慣」的觀點其實很有說服力。不久之後，王國維(1877-1927)即呼應他的看法，發表〈論新學語之輸入〉(1905)一文，肯定日譯名詞在引進新學術上的價值。他說：

十年以前，西洋學術之輸入，限於形而下學之方面，故雖有新字新語，於文學上尚未有顯著之影響也。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無以創造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竊謂節取日人之譯語，有數便焉：因襲之易，不如創造之難，一也；兩國學術有交通之便，無扞格之虞，二也。（叔本華譏德國學者于一切學語不用拉丁語，而用本國語，謂如英法學者亦如德人之愚，則吾儕學一專門之學語，必學四五度而後可，其言頗可味也。）有此二便而無二難，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²²

王國維很清楚地看到「好奇者」與「泥古者」在詞彙論爭上的對立，希望走出另外一條路。因此他一方面對於濫用日譯新名詞或其中不妥者，均有所保留（如

²¹ 這是服部宇之吉在《心理學講義》所撰寫的前言，轉引自黃興濤，〈日本人與和製漢字新詞在晚清中國的傳播〉，《尋根》，2006年第4期，頁46。

²²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靜庵文集》，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冊5，頁98-99。

日人將 intuition 與 idea 譯為「直觀」與「觀念」，王國維認為即是偏離本義），另一方面則主張大多數的日譯名詞是國人接受現代學術的一條捷徑，不宜輕言放棄。²³他所提出的觀點並非毫無脈絡可循，而是源於他對張之洞所主導的教育改革方案與嚴復翻譯用語的雙重不滿。²⁴他從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觀點出發，強調哲學（而非張之洞所主張的宋明理學）在教育中的角色，可由此而培養完整的個人，而在這方面日本學界已經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足資效法。美國學者 Joey Bonner 所撰《王國維》一書對此議題有深入的分析，茲不贅述。²⁵

上述服部宇之吉和王國維的言論主要是從學術、教育的角度立論。不過新名詞所涉及的爭論不只在學術、教育方面，也和政治立場與權力鬥爭有關。1904年之後，有一場新、舊黨之間的「新名詞之戰」。不過此時的新、舊黨已不僅是維新與反維新之爭，也包括支持「中體西用」的改革派與革命派之間的爭論。1904年9月17日，宣傳革命的《警鐘日報》記載了一則標題為「新名詞被黜」的消息。浙江省擬派遣官紳各10人赴日進修，培養「速成政法官」，由浙江巡撫聶緝槩（1855-1911，曾國藩女婿）捐廉籌款，並親自考試。結果：「知縣趙熙光竟以用新名詞過多被黜。聞趙君甚喜新學，時向浙江藏書樓借閱新書瀏覽，為官場中所僅見，而此次不得與派出洋之列，知者咸惜之。」²⁶趙為廣東舉人，事跡不詳，1895年（光緒21年）曾與梁啟超等人為割讓台灣事，共同上一呈文，希望能「勿割台灣以塞夷心而慰民望」，由此可見其與維新派關係密切。²⁷無論如何，當時使用新名詞無疑地具有支持新學的象徵意義，因而受到壓制。

²³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靜庵文集》，收入《王國維遺書》，冊5，頁100。

²⁴ 有關王國維對嚴譯之批判，參見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87-88。

²⁵ 有關王國維對張之洞教育改革的整體性的批判，見 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44.

²⁶ 〈新名詞被黜〉，《警鐘日報》，1904年9月17日，第2板。

²⁷ 〈廣東舉人陳景華等呈文〉，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295。

這種爭執在學校之內更爲普遍。1904年，湖北方言學堂有一名歷史教員趙伯威也是常用新語、提倡新學之人，當時輔佐湖北巡撫張之洞籌辦農務、工藝、軍事等各類專業學堂的梁鼎芬(1859-1920)對他很不滿意，因而「藉故去之」，並更換了「摭拾東洋史要諸書，略爲綴連」的另一名教師。²⁸再者，師生之間也因此而生爭端。湖北師範學堂有一門名爲「倫常」的課程，其中一名學生「屢以用新倫理名詞被斥，深恨之」。有一次他改變寫作方式，不用新語，而專用舊詞。老師閱讀之後十分高興，「遂大加獎勵」。這件事情被支持新派的《警鐘日報》報導，並視爲笑柄。²⁹

在言論界，此類衝突更爲顯著。1904年，《東方雜誌》首先刊出〈今日新黨之利用新名詞〉，一方面攻擊新名詞，如「冒險」、「人類平等」、「家庭革命」、「婚姻自由」等，另一方面也對新名詞、新學之傳播所帶來道德的敗壞，提出嚴重的批評：「吾國未有新學以前，國中士大夫，雖黑暗、雖腐敗，然舊道德猶存方。……自此種新名詞出，於是前此之顧忌諱飾而爲之者，今則唐然皇然，有恃無恐。」³⁰這一篇文章刊出之後，「新黨」感到不滿，因此有人撰寫〈論今日舊黨之用新名詞〉，認爲「今日之舊黨，亦恒用新名詞，尤爲近今新事業之障礙」。他們舉出的新名詞如「保存國粹」、「排外思想」、「外交手段」、「維持秩序」、「妨礙治安」等觀念的使用都影響到新思想的傳佈，其結論是「新事業可仇，而新名詞獨不可仇」。³¹

舊派人士對此回答並不滿意，1906年10月28日，《申報》又刊出〈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東方雜誌》並加以轉載，廣爲傳播。這一篇文章仍繼續強調「爲惡爲非者均恃新名詞爲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³²面對這種情況，企圖保存「國粹」的人士如張之洞等，在1905年之後開始提出「消極」與「積極」的兩大策略，消極的

28 〈方言學堂歷史教師之優劣〉，《警鐘日報》，1904年9月16日，第2板。

29 〈師範學堂笑柄〉，《警鐘日報》，1904年9月16日，第2板。

30 〈今日新黨之利用新名詞〉，《東方雜誌》，卷1期11(1904)，頁75-76。

31 〈論今日舊黨之用新名詞〉，《警鐘日報》，1904年10月17日，第1板。

32 〈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東方雜誌》，卷3期12(1906)，頁239-240。

是「禁用新名詞」，積極的則是「設立存古學堂」。³³然而這些政策都受他人質疑。誠如商務印書館的高鳳謙（夢旦，1870-1936）所論，「今之所謂新名詞者，大抵出自翻譯，或逕用東鄰之成語。其扞格不通者，誠不可勝數，然而欲一切屏棄不用，則吾又以為甚難。」因為不但翻譯書刊、報章大量使用新名詞，甚至「奏定之章程，欽頒之御旨」都用新名詞。高鳳謙還語帶諷刺地說：「又況國粹新名詞也，新名詞亦新名詞也。反唇相稽，未有不啞然失笑者矣。」³⁴

最有趣的是高鳳謙還指出「存古」二字亦非固有詞彙，且其涵義也有問題：「陽湖陸煒士語余曰：存古二字，不成名詞。遍稽載籍，就耳目之所睹記，曰好古、嗜古、尊古、重古、修古、考古、師古、法古之屬多矣，從未聞有所謂存古者也。」³⁵除此之外，高鳳謙沒有注意到其實他在文中所用的「消極」、「積極」兩詞也是來自日本。

上述新舊雙方相互指控對方運用新名詞，可以顯示新名詞的使用，至清末已經到了不可抵擋的局面，無論贊成還是反對，人們在行文論述之時，很難避免這些引自日本的詞彙。當時除了上述所謂「禁用新名詞」與「設立存古學堂」兩種對抗途徑之外，還有一種對抗方式是由國人另造新語或修改日譯。在這方面嚴復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三、嚴復對抗東學與東語

在近代中國翻譯史上，嚴復乃直接自英文翻譯西書，與梁啟超等人透過日

³³ 1905年即有此主張，見〈兩湖總督張札設存古學堂文〉，《東方雜誌》，卷2期1(1905)，頁10-14。1907年6月（光緒33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設立湖北存古學堂，以原經心書院故址改設。張之洞當時在奏摺中便說：「後如無窒礙，即請學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辦理。」後來江蘇、山西、安徽、福建、貴州、陝西、廣東、四川、甘肅等省相繼開辦。參見羅志田，〈溫故知新：民間的古學復興與官方的存古學堂〉，《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83-142。

³⁴ 高鳳謙，〈論保存國粹〉，《教育雜誌》，卷1期7(1909)，頁80。

³⁵ 高鳳謙，〈論保存國粹〉，《教育雜誌》，卷1期7(1909)，頁81。陸煒士曾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辭典部。

本學術界，間接來認識西方的翻譯形態，形成不同的學術傳承。嚴復一直對於梁啟超式的「東學」深表不滿。³⁶在 1902 年寫給門生熊季廉的信中，他表達了此一觀點：

至一切新學，則不求諸西而求於東。東人之子來者如鯽，而大抵皆濫竽高門，志在求食者也。吾不知張南皮輩率天下以從事於東文，究竟捨吳敬恆、孫揆陶〔鈞〕等之驕翳有何所得也？³⁷

須知今日天下洶洶，皆持東學；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燄，……往者高麗之事起於東學，中國為之續矣。可悲也夫！復願季廉必無以東學自誤也。……上海所賣新翻東文書，猥聚如糞壤。但立新名於報端，作數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間，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學界近狀也。³⁸

嚴復在 1905 年(光緒 31 年)底寫給曹典球(1877-1960)的信中也大力抨擊東學，他說：

大抵翻譯之事，從其原本本書下手者，已隔一塵，若數轉為譯，則源遠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頗怪近世人爭趨東學，往往入者主之，則以謂實勝西學。通商大埠廣告所列，大抵皆從東文來。夫以華人而從東文求西學，謂之慰情勝無，猶有說也；至謂勝其原本之睹，此何異睹西子於圖畫，而以為美於真形者乎？俗說之諺常如此矣！³⁹

這幾封信顯示嚴復將中國學界的混亂，主要歸諸大量從日文而來的翻譯作品，

³⁶ 嚴復的觀點其實和梁啟超在 1921 年所撰《清代學術概論》中的自我批判是一致的。任公說「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4），頁 71-72。

³⁷ 嚴復，〈致熊季廉·七〉，嚴復著，王慶成等編，《嚴復合集》（台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冊 5，頁 19。孫揆陶應為孫揆鈞（一作均，1856-1930）之誤，此處所指的是 1902 年成城學校入學事件，吳敬恆與孫揆鈞糾眾向駐日公使蔡鈞請願，後被遣送回國。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 20-22。值得注意的是嚴復在文中也批評張之洞鼓勵留學日本的主張。

³⁸ 嚴復，〈致熊季廉·八〉，嚴復著，王慶成等編，《嚴復合集》，冊 5，頁 21-22。

³⁹ 嚴復，〈與曹典球書·三〉，嚴復著，王叔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3，頁 567。

其內容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未能得到西學之精髓。他感嘆地說：以「東學」為「新學」的結果，只是造就了一些像吳敬恆、孫揆鈞等鬧學潮的學生，以及「輕佻浮偽，無縝密誠實之根」的學風。

嚴復不但對東學不滿，對日本譯詞也採取批評的態度，如好用贅詞。⁴⁰他和當時許多學者一樣，在翻譯之時不得不利用部份源於日本的翻譯詞，⁴¹但他卻常常修正日本的翻譯，或另鑄新詞，企圖取而代之。嚴復翻譯之時採取好幾種不同的手法，或是音譯，或是義譯，或是兩者結合。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首先是音譯的翻譯語（有些音譯也同時具有義譯的考量）。例如，在《群學肄言》中，嚴復可能為了凸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有機體論」，鑄造了一對「拓都」與「么匿」譯詞〔嚴復有時亦譯為「群」與「己」（或小己）〕。這兩個詞在日譯中多稱為「團體」⁴²（或社會）與「個人」（或單位）。嚴復在該書〈譯餘贅語〉對此有所說明：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即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相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⁴³

「么匿」一語源於 unit，而「拓都」應該是來自 total。不過如果我們對照《群

⁴⁰ 如嚴復批評日本名詞常用複詞，過於累贅。他說：「按憲法二字連用，古所無有，……憲即是法，二字連用，於辭為贅。今日新名詞，由日本稗販而來者，每多此病。」見嚴復，〈憲法大義〉，嚴復著，王杖主編，《嚴復集》，冊 2，頁 238。

⁴¹ 馬西尼指出嚴復使用了一些新詞，如「化學」、「民主」、「自由」、「文學」、「議院」、「國債」、「保險」等，見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頁 136。他似乎沒注意嚴復以「質學」翻譯今日的化學。

⁴² 1903 年的〈新定學務綱要〉中認為「團體」一詞「欠雅馴」，見《東方雜誌》，卷 1 期 3(1904)，頁 64。

⁴³ 嚴復，〈譯餘贅語〉，斯賓塞著，嚴復譯，《群學肄言》（台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冊 10，頁 8。

學肆言》的原文，發現「拓都」其實是譯自 aggregate，嚴復可能覺得 aggregate 音節過多，因此改以 total 的發音作為譯語。在嚴復的著作中，常運用此一對名詞，如在〈天演進化論〉一文中他說：

必欲遠追社會之原，莫若先察其么匿之為何物。斯賓塞以群為有機團體，與人身之為有機團體正同。人身以細胞為么匿，人群以個人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⁴⁴

斯賓塞曰：生物么匿無覺性，而全體有覺性。至於社會則么匿有覺性，而全體無別具覺性。是故治國是者，必不能以國利之故，而使小己為之犧牲。蓋以小己之利而後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無所利則群無所為立，非若生物個體，其中一切么匿支部，捨個體苦樂存廢，便無利害可言也。⁴⁵

這是嚴復使用「拓都」與「么匿」的例子，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嚴復在文中同時也運用日譯新名詞如「社會」、「個體」、「團體」、「有機」等來輔助闡釋其意念。這顯示嚴復在鑄造新詞之時，也採納了不少日本翻譯語。此一現象十分重要，下文會再作討論。

「拓都」與「么匿」曾有一段時間活躍於中文世界。其中最欣賞這個譯詞的可能是魯迅(1881-1936)。他還猜測「么匿」大概是從中國古書來的，既古雅又音義雙關。他說：

從前嚴幾道從甚麼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罷——找著了「么匿」兩個字來譯 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⁴⁶

然而運用最多者要推梁啟超。他在《新民說》〈論私德〉中說：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群

⁴⁴ 嚴復，〈天演進化論〉，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2，頁310。

⁴⁵ 嚴復，〈天演進化論〉，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2，頁315。

⁴⁶ 魯迅，〈難得糊塗〉，《准風月談》，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卷5，頁373。

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為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見侯官嚴氏所譯《群學肆言》。其云拓都者，東譯所稱團體也；云么匿者，東譯所稱個人也。）⁴⁷

此外還有兩個例子，一是《新大陸遊記》，一是〈余之死生觀〉：

凡人處於空間，必於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時間，必於現在安富尊榮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進步，緝熙于光明，否則凝滯而已，墮落而已。箇人之么匿體如是，積箇人以為國民，其拓都體亦復如是。⁴⁸

佛教之反對印度舊教言靈魂者何也？舊教言輪迴言解脫，佛教亦言輪迴言解脫，獨輪迴解脫之主體，舊教惟屬諸么匿，佛則么匿與拓都並言之，而所重全在其拓都，此其最異之點也。……景教有最精要之一言焉，曰三位一體，……以拓都體言之，則曰聖靈，以么匿體言之，則曰靈魂。⁴⁹

劉師培(1884-1919)也使用此二翻譯語彙，來說明個人與社會之關係以及中西倫理之差異：

社會合眾人而後成，個人即為社會之分子。就個人而言之，謂之么匿，或謂之小己。合一群而言之，謂之都拓，或謂之團體。拓都為么匿之範圍，么匿為拓都所限制，此即個人與社會之關係也。

西洋以人為本位，中國以家為本位。故西洋以個人為么匿，社會為拓都，拓都、么匿之間別無階級。而中國則不然。個人社會之間介以家族。故西洋家族倫理始於夫婦一倫，中國家族倫理莫重於父子一倫。⁵⁰

⁴⁷ 梁啟超，《新民說》，頁118-119。

⁴⁸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台北：藝文印書館據光緒29年(1903)新民叢報臨時增刊編印本影印，1966），頁191-192。

⁴⁹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17，頁2、5。

⁵⁰ 劉師培，《倫理教科書》，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寧南武氏1936

拓都、么匿甚至還成爲學校考試、作文習題。根據郭沫若(1892-1978)記載：民國初年，天津軍醫學校的復試中，除了「科學方面的題目」外，還有一道叫做「拓都與么匿」的國文題，讓他覺得「莫名其妙」，可見這兩個詞彙在民初時已經很罕見了：

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做「拓都與么匿」。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著頭腦。我自己不記得糊里糊塗地寫了些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在出場後誰都在叫苦，說莫名其妙。……「拓都與么匿」！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卻是懂到了。他對我們說：「這是 total and unit 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這個人的姓名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他曾經讀過嚴幾道譯的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題，實在足以把人難倒。這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膽量等待揭曉，……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⁵¹

郭沫若離開天津之後，去了北京，住在一位朋友的家中。他告訴這位朋友國文考題爲「拓都與么匿」時，朋友回答說這樣的作法簡直是「胡鬧」。⁵²清末民初之時，中小學校考試或作文題以嚴復譯作或嚴譯概念來命題，頗爲普遍。胡適(1891-1962)提到 1905 他在澄衷學堂時，有一次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伸其義」；⁵³何炳棣則回憶 1936 年，第四屆中英庚款留學考試的英文試題中，中翻英的考題是「捨己爲群」的一段文字，何炳棣說：「漢譯英一

年排印本重印，1997），下冊，頁 2057-2059。都重萬指出，1903 年起，劉師培大量閱讀嚴復的譯作，這些作品提供了他新鮮的學術術語與嶄新的價值尺度，讓他從一個新的觀點來研究傳統學術。都重萬，〈嚴復對劉師培學術思想及《國粹學報》學術宗旨之影響〉，收入習近平編，《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頁 258-268。

⁵¹ 郭沫若，《少年時代》，收入《沫若自傳》（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卷 1，頁 318-319。

⁵² 郭沫若，《少年時代》，收入《沫若自傳》，卷 1，頁 321。

⁵³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6），頁 49。

段定是取自嚴復自譯小穆勒《群己權界論》之後『通俗化』的短篇論文。」⁵⁴

無論如何，民國初年之後「拓都」與「么匿」的兩個音譯名詞迅速消逝。又如「涅伏」為嚴復譯自英文的 *nerve*（神經）一詞，他企圖取代早期傳教士翻譯的「氣筋」和「腦氣筋」（《萬國公報》與譚嗣同的《仁學》均使用「腦氣筋」）。⁵⁵在《天演論》中他說：「官與物塵相接，由涅伏（原註：俗曰腦氣筋）以達腦成覺，即覺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動。」⁵⁶在《群學肄言》中亦有：「涅伏者（原注：俗名腦氣筋），所以主知覺運動，與心肺營衛之張翕也。」⁵⁷然而其他使用「涅伏」一語者甚少，除了嚴復之外，大概只有魯迅使用過。⁵⁸在 1903 年出版的《新爾雅》之中，編者在「釋生理」中採用了日本翻譯的「神經」，⁵⁹並詳細地解說各種神經系統，如「腦神經」、「視神經」、「脊椎神經」等。1911 年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也採用「神經」，並在其下註明「腦氣筋」：

神經（腦氣筋）：動物體固有之索狀機關，以媒介運動傳送感覺為主。

又司分泌，由微細之纖維而成。以脊椎及延髓為中樞，分布於身體各部。為網狀或樹枝狀者，謂為末梢神經，司遠近各機關之傳導感覺。⁶⁰

這樣看來，「腦氣筋」一詞存在的壽命可能要超過「涅伏」。無論如何，民國以後「涅伏」就完全為「神經」所取代。

「涅伏」與嚴復所翻譯的「涅菩刺斯」(*nebulas*)和佛教語彙「涅槃」有一字相同，而讓人覺得此類翻譯語彙具有佛經的意味。這無疑源於嚴復對佛經的

⁵⁴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頁 144-147。

⁵⁵ 網路資源：黃河清，〈神經考源〉，<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huangheqing/hhq04.htm> (2008/11/24)。

⁵⁶ 出自〈導言二〉的按語，見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7。如嚴復，〈《蒙養鏡》序〉中有「涅伏暫亂，喜怒變常」，見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 2，頁 255。

⁵⁷ 斯賓塞著，嚴復譯，《群學肄言》，頁 77。「營衛」今譯動脈。

⁵⁸ 魯迅，〈序言〉，《集外集》，收入《魯迅全集》，卷 7，頁 4：「我的文章裡，也有受著嚴又陵的影響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經』的臘丁語音譯，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

⁵⁹ 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頁 148-151。

⁶⁰ 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十畫，498 條。

熟稔，因而成為嚴復音譯語的重要特色。⁶¹吳建林在分析嚴復譯詞時，曾舉出好幾個類似的例子。例如嚴復將 Royal Bank 翻譯為「賴耶版克」，自註「賴耶，本梵語，譯言王家」。賴耶源自「阿賴耶」，為梵語 *alayavijnana*（藏識）。其他的音譯語如「賴摩」（Lima，秘魯首都）、「毗勒」（bill，嚴復自註：「此名交易單，亦曰期票」。書後的譯名表則稱「匯票」）、「須彌」（Himalayas，喜馬拉雅）、「羯羅屈閣」（Calcutta，加爾各答）等都有佛教語彙的意味。⁶²此一特色是否影響到詞彙的傳播則仍待探究。

「涅伏」一詞雖為人們所放棄，不過也有一些嚴復所創造的音譯語繼續為人們所使用，例如將 Logic 翻譯為「邏輯」。眾所周知，嚴復將 Logic 譯為「名學」，用以對抗日譯之「論理學」，但是他也兼用音譯的「邏輯」。在《穆勒名學》的開始部份，有一節的標題即為「論邏輯之為學為術」。日譯的「論理學」一詞應來自英文 *Science of Reasoning*（推理的科學），嚴復斥之為「淺陋」。章士釗(1881-1973)曾解釋為何該詞「淺陋」，他說：「誠哉，其淺陋也，蓋 Reasoning 僅屬於題達邏輯之一部。」「題達」乃 *deduction*（今譯演繹）。章士釗顯然認為論理學一詞未能包括「陰達」(*induction*)，故不夠理想。但是章士釗也批評嚴譯的「名學」，因為「『名』字之義，見於吾經典者，容足盡亞里士多德之邏輯，至倍根以後之邏輯，則萬萬非名字涵義所有」，所以章士釗大力提倡「邏輯」之譯語。⁶³這一個譯詞也因此而打敗了早期傳教士所翻譯的「辨學」、嚴復（較支持）的「名學」與日本的「論理學」，成為今日普遍使用的譯名。⁶⁴

⁶¹ 嚴復很熟悉佛典，例如 1921 年，嚴復曾為亡妻王夫人手抄《金剛經》一部，以求冥福。嚴復，〈與諸兒書〉，嚴復著，王棫主編，《嚴復集》，冊 3，頁 824。再者，嚴復也很注意佛教對中國語彙的影響，他說：「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體用、若能所權實，皆自佛教東漸而後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嚴復，〈與梁啟超書·二〉，嚴復著，王棫主編，《嚴復集》，冊 3，頁 518。

⁶² 吳建林，〈論嚴復於《原富》內經濟類名詞之翻譯手法及其所譯名詞之消亡〉（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52-53。

⁶³ 章士釗，〈釋邏輯〉，收入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安主編，《章士釗全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冊 2，頁 210。

⁶⁴ 這幾個譯名的淵源與競爭可參見 Joachim Kurtz, "Coming to Terms with 'Logic': The

嚴復所發明的音譯還有「版克」（或板克，bank），現譯為「銀行」；⁶⁵「涅菩刺斯」(nebula)，現譯為「星雲」；⁶⁶「拂特」、「拂特之制」(feudalism)或「拂特封建」（音譯加上通行之翻譯語），現譯為「封建」；⁶⁷「威朵」(veto)，現譯為「否決」；「美台斐輯」(metaphysics)，現譯為「形而上學」⁶⁸等。根據筆者初步的統計，嚴譯名著中被後人放棄的音譯名詞，其總數要超過 200 個。

音譯名詞在剛開始時不易為人所瞭解，因而引發爭執。第一類爭執是有關普通名詞。例如 1912 年《民立報》上有一位記者認為音譯名詞不應兼有義譯，容易造成混淆。如嚴復將 Utopia 譯為「烏託邦」（現作「烏托邦」），而且自以為「巧奪天工」。有些讀者對之頗為激賞，說「理想國譯為烏託邦，則烏有與寄託二義，皆大顯明。」⁶⁹不過有些人則不予認同，認為「嚴譯烏託邦，謂等於冰麒麟」、「與洋奴所寫之冰麒麟 Ice Cream 可以同類而觀」。以上的觀點，顯示對於嚴復同一譯詞的兩極看法。⁷⁰第二類爭執則有關專有名詞的翻

Naturalization of an Occidental Notion in China,"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Leiden: Brill 2001), pp. 147-176.

⁶⁵ 嚴復將銀行譯為「版克」可能也得到少數人的讚賞，這方面有一個間接的證據。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3 號上有一封讀者王敬軒的投書，表示「譯音之字，亦復兼義。如……銀行曰板克，大板謂之業，克勝也。板克者，言營業操勝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及。」劉半農則持反對意見，他說：「先生以『大板謂之業』來解釋這「板」字，是無論那一種商店都可稱『板克』，不必專指『銀行』；若有一位棺材店老板，說『小號的圓心血板，也可以在營業上操勝算，小號要改稱板克』，先生也贊成嗎？」見劉復著，痙弦編，《劉半農文選》（台北：洪範書局，1978），頁 13、29。據研究，這封投書與回信是錢玄同與劉半農所演的雙簧：「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為了推動文學革命運動，開展對復古派的鬥爭，曾由編者之一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把當時社會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論調集中起來，摹仿封建復古派口吻寫信給《新青年》編輯部，又由劉半農寫回信痛加批駁。兩信同時發表在當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見魯迅，〈憶劉半農君〉的註釋，〈且介亭雜文〉，收入《魯迅全集》，卷 6，頁 74。

⁶⁶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頁 6。

⁶⁷ 「拂特」見穆勒著，嚴復譯，《群己權界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 78；「拂特之制」見《群學肄言》，頁 164，「拂特封建」見甄克斯原著，嚴復譯述，《社會通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 60。

⁶⁸ 《新民叢報》，1904 年第 50 號的「新釋名」收錄有「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解釋（譯自《教育辭書》），見頁 116。

⁶⁹ 劉復著，痙弦編，《劉半農文選》，頁 13。

⁷⁰ 章士釗，〈釋邏輯〉，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安主編，《章士釗全集》，冊 2，頁 211。章士

譯。《民立報》上有讀者投書，表示他讀到章士釗把一個英國人名翻譯為「戴雪」。他認為「譯歐洲人名、地名，尤不可類於中土、中地。……強以漢姓被西人，是強西人入我國籍，改從漢姓也，是大不可。」⁷¹章士釗則回應說，該人的英文名字發音「確是戴是雪」，而嚴復在《社會通詮》中翻譯為「戴視」；而梁啟超則譯為「諦西」。章士釗說：「諦字音不確，惟以足下名從主人之義繩之，或者諦西為良譯乎。」⁷²這一方面顯示音譯所造成的諸多困惑，也反映出譯名不統一在當時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涉及學部「名詞館」的設立，下文會再作討論。不過，也有一些嚴復翻譯的人名為人們所稱道，並使用至今。如《天演論》作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原譯作「赫施賚」。⁷³王爾敏認為，赫胥黎的翻譯「最具深意，使人一見此名，即能領略其代表人物的學問思想，真是表現了深厚學養。」⁷⁴

除了音譯語彙之外，嚴復也創造了不少義譯的翻譯名詞，這方面又可以分為好幾類來說。首先，嚴復所翻譯的學科名稱幾乎全部被放棄，例如生學（生物學）、質學（化學）、計學（經濟學）、群學（社會學）、⁷⁵斐洛蘇非譯言愛智（哲學）、⁷⁶天學或天官之學（天文學）、名學或名理之學（邏輯）、內景之學（physiology，現為生理學）、（鉅）驗之科（anatomy，解剖學）、言語科（rhetoric，修辭學）、字學（philology，語言學或文獻學）、物性之學

釗，〈附錄：論譯名〉，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安主編，《章士釗全集》，冊2，頁231。「冰麒麟」可是能是粵語發音之音譯，亦作「冰忌廉」，現作冰淇淋。

⁷¹ 章士釗，〈附錄：論譯名〉，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安主編，《章士釗全集》，冊2，頁231。

⁷² 章士釗，〈論譯名按語〉，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安主編，《章士釗全集》，冊2，頁230。章士釗可能沒有想到梁啟超是以廣東話的發音來翻譯此字。

⁷³ 赫施賚著，羅亨利、〔清〕瞿昂來譯，《格致小引》（上海：清江南製造總局排印本，1886）。

⁷⁴ 王爾敏，〈從「互動」這個新詞說起〉，《水手的話》（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7），頁133。

⁷⁵ 有關 sociology（社會學）一語在日本的情況，及其中文之譯介，見馮天瑜，《新語探源》，頁562-565。王爾敏指出，抗戰以後尚引用「群學」一詞者，只有錢鍾書一人。又，1899年（光緒25年），蔡爾康曾將 sociology 翻譯為「大同學」，不過也成明日黃花。見王爾敏，〈名號今昔觀〉，《橋乘小品》（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頁71-72。

⁷⁶ 嚴復在「斐洛蘇非」之後自註「譯言愛智」，見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頁18。有關 philosophy 一語之中譯，參見鍾少華，〈清末中國人對於「哲學」的追求〉，《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2期2（1992），頁159-189。

(ontology, 本體論)、智環或學鄒(encyclopedia, 百科全書)⁷⁷等。

其次, 嚴復所翻譯的英文文法名詞, 大多數也都被放棄。例如名物(noun, 名詞)、稱代(pronoun, 代名詞)、區別(adjective, 形容詞)、云謂(verb, 動詞)、疏狀(adverb, 副詞)、介系(preposition, 此一翻譯與目前的介詞、介系詞很類似)、契合(conjunction, 連接詞)、叱嘆(interjection, 感嘆詞)⁷⁸。不過也有一部份保存下來, 例如元音(vowels)、句法(syntax)、主語(subject)、謂語(predicate)、虛擬語氣(subjunctive mood)、祈使語氣(imperative mood)、及物(transitive)、不及物(intransitive)等。⁷⁹

再其次, 嚴復義譯詞之中有不少是源自中國古代的用法, 這些較為典雅的詞彙也遭到淘汰。錢穆(1895-1990)《師友雜憶》中有一個有趣的例子。1912年(民國元年), 錢穆向友人三兼小學創辦人秦仲立借閱金陵刻線裝本的嚴譯《群學肄言》。仲立希望他閱讀時如遇不認識之生字, 能查字典並鈔錄。錢穆歸還該書時, 仲立不但詢問該書大義, 還隨手翻閱一頁, 見到「櫓」字, 即問該字音義。錢穆回憶了這一段經歷:

余答當讀「音」, 乃地下室也。仲立言然, 並云: 曾遍查康熙字典未得其字, 只有窰字, 解地窰。蓋中國地下室僅一土穴, 西洋地下室加木製, 嚴氏乃特造此字耳。⁸⁰

可見嚴復對於採取古字所做的翻譯詞, 也注意到中西的差異, 而加以調整。

⁷⁷ 嚴復, 〈書《百科全書》〉, 嚴復著, 王栻主編, 《嚴復集》, 冊2, 頁251。

⁷⁸ 嚴復在1900-1902年間即開使用「名物」、「區別」來翻譯 noun 與 adjective。例如, 他在與梁啟超論學時曾說: 「譬如 Economics 一宗, 其見於行文者, 或為名物, 或為區別。自當隨地斟酌」, 嚴復, 〈與梁啟超書·三〉, 嚴復著, 王栻主編, 《嚴復集》, 冊3, 頁518。不過在《穆勒名學》中, 除了「名物」、「區別」採相同的翻譯語之外, 其他幾個詞彙的翻譯則略有出入, 如 verb 譯為「動作詞」、adverb 譯為「形況字」、pronoun 譯為「代名字」、conjunction 譯為「綴句字」、preposition 譯為「綴名字」、interjunction 譯為「嗟嘆字」。見穆勒著, 嚴復譯, 《穆勒名學》(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8), 頁9。

⁷⁹ 鄒振環, 〈翻譯大師筆下的英文文法書——嚴復與《英文漢詁》〉,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年第3期, 頁57。本文對《英文漢詁》的編纂與影響有詳盡的分析。該書署名 Julin Khedau Yen-Fuh, 鄒振環表示: 「嚴復取以 Julin Khedau 為名, 其有何深意, 實在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頁53) 其實 Julin Khedau 是嚴復以英文字母拼寫「又陵幾道」。

⁸⁰ 錢穆, 《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合刊》(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83), 頁69-70。

嚴復採用古字所做的義譯名詞數量不少，茲舉數例。如 university 譯為「國學」（有時採音譯為「優尼維實地」）；⁸¹immigration bureau 譯為「徠民之部」；⁸²bridesmaids 譯為「扶孃」；fee 譯為「貶」；bribe 譯為「賂」；telescope 譯為「璇璣」；beef 譯為「羹脯」；⁸³lottery 譯為「鬪博」；market 譯為「市廛」；wage 譯為「庸」等等。這些源於古語的翻譯，大概較不容易為受到五四白話文運動洗禮之年青人所喜愛。

在上述幾種義譯名詞之中，有一些不但受到古語啟發，而且經過嚴復斟酌考量，值得較深入地討論。例如「有官」、「無官」與「官品」、「非官品」等詞（日譯為「有機」、「無機」），嚴復最早在《天演論》中採取此一翻譯。在該書「論一」的按語，嚴復說：

晚近生學家，謂有生者如人禽虫魚草木之屬，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無官，曰非官品。無官則不死，以未嘗有生也。而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兩物。⁸⁴

這一段其實不是嚴復自己的話，而是譯自赫胥黎原書的註釋，而「官品」源於 organism 一字。⁸⁵梁啟超對上述的話有深刻的印象，他在〈余之死生觀〉中引用嚴復所謂「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並將之與佛教羯磨的看法，所謂「真如」、「無明」，相熏相習的理論相比較，認為兩者「若合符契也」。⁸⁶

⁸¹ 「國學」見嚴復，〈斯密亞丹傳〉，亞當·斯密著，嚴復譯，《原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1。「優尼維實地」，見亞當·斯密著，嚴復譯，《原富》，頁136。

⁸² 見甄克斯原著，嚴復譯述，《社會通詮》，頁17。「徠民」二字出於《商君書·徠民第十五》。查索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2008/11/14)。

⁸³ 馬西尼注意到嚴復喜用古語來翻譯食物名稱。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頁136。

⁸⁴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頁3。

⁸⁵ Thomas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c. 1901), p. 87.

⁸⁶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17，頁3。

根據王道還的研究，《天演論》中這一段按語是赫胥黎徵引德國學者魏斯曼（August Weismann, 1834-1914，嚴復譯為懷士滿）的理論，上文中之「死者」與「不死者」分別指「體質」與「生殖質」（the germ-plasma）。赫胥黎徵引魏斯曼理論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批判斯賓塞所支持的「後天形質遺傳說」（即 Lamarckian mechanism，拉馬克機制）。⁸⁷嚴復這時或許還不知道日人將 organism 譯爲「有機」。有機一語的引進中文，最早可能是梁啓超透過吾妻兵治（1853-1917）於 1899 年在東京善鄰譯書館所出版的漢譯伯倫知理《國家學》[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 *The Theory of the State*]，同年梁任公在《清議報》第 15 期之上發表〈國家論〉一文。文中在「國家者蓋有機體」之下有一說明：「有機、無機皆化學語，有機，有生氣也，人獸草木是也；無機，無生氣也，土石是也。」⁸⁸這一個註解其實是源自吾妻兵治，而略作改動，吾妻氏的原文是：「化學語，動物植物曰有機，金石類曰無機」，⁸⁹由此可見，梁任公增加的詮釋十分有限。無論如何，有機、無機，以及有機體、無機體或有機物、無機物等語在中國迅速流傳，1903 年的《新爾雅》上解釋該二名詞：「具動植物體之生活力者，謂之有機物，無此生活力者，謂之無機物。」⁹⁰

至 1906 年，嚴復在上海演講《政治講義》之時，以有機來翻譯 organism 似乎已廣爲流行，嚴復將此一翻譯與他所使用的「官品」加以比較，而自信地說「官品」的翻譯要比「有機」來得好：

按「有機」二字，乃東文取譯西文 Organism。其字原於希臘，本義為器，又為機關。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機關；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機關，但與前物，生死異耳。近世科學，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機關，以司各種生理之功用者，謂之有機體。不佞前譯諸書，遇此等名詞，則翻官品。譬如人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

⁸⁷ 王道還，〈《天演論》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2005 年 12 月 12 日。

⁸⁸ 伯倫知理著，梁啓超譯，〈國家論卷一〉，《清議報》，1899 年第 15 期，頁 6。

⁸⁹ 伯倫知理著，吾妻兵治譯，《國家學》（東京：善鄰譯書館，1899），頁 7 上。

⁹⁰ 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頁 137。

中，而有目為視官，有耳為聽官，手為司執，足為司行，胃為消化之官，肺為清血之官，皮膚為出液之官，齒牙為咀嚼之官。百骸、五臟、六腑，無一不有其形矣。有形即有其用，此兩間品物中，機官〔關〕之最為茂密完具者也。官品云者，猶云有官之品物也。有機體云者，猶云有機關之物體也。禽獸之為官品，與人正同，特程度差耳。故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降至昆蟲、草木，亦皆官品。……官品、有機體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較有機體為優。蓋各種木鐵機器，可稱有機之體，而斷不可稱官品。然則「官品」二字，誠 Organism 之的譯矣。⁹¹

「官品」一譯語也受到魯迅的喜愛，他在 1907 年撰寫〈人之歷史〉，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學說及其歷史時，反覆地使用「官品」一譯詞。⁹²然而即使如此，官品還是難逃被淘汰的命運。

又如英文的 organize 與 organization 日譯為「組織」，嚴復則主張翻譯為「部勒」。1903 年的〈新定學務綱要〉也對「組織」一詞不滿意，認為「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⁹³的確，傳統語彙之中「組織」指紡織品的編織，如「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⁹⁴嚴復所採用的「部勒」一詞其實是傳統語彙，指部署、約束或佈局，⁹⁵其意義與 organize 十分接近。在《群學肄言》中他解釋「社會」一概念即說：「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嚮者，曰社會。」⁹⁶其他的例子如：

有呼裏庚者，譯言黑伯，于俄民之等為下下。頑固之黨，特取而部勒

⁹¹ 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 5，頁 1255。

⁹² 《魯迅全集》，卷 1，頁 8-17。

⁹³ 〈新定學務綱要〉，《東方雜誌》，卷 1 期 3 (1904)，頁 64。

⁹⁴ 〔唐〕李延壽撰，《北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 90，〈何稠傳〉，頁 2985。

⁹⁵ 「部勒」一詞出自《史記·項羽本紀第七》：「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查索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2008/11/14)。

⁹⁶ 嚴復，〈譯餘贅語〉，《群學肄言》，頁 8。

之，以為與立憲背馳之利器，大都主煽動民訛，而誑誘猶大。⁹⁷

有西班牙貴冑軍官名羅耀拉(Don Iñigo de Loyola)者，慨舊教之陵遲，乃結合同志少年，別立章規，以為宗教中興之業。一千五百三十七年，立耶穌軍之號，名助羅馬教皇，故其入羅馬也，教皇保羅第三甚悅禮之。顧其宗旨部勒，所與舊天主教異者，可略言如下：以兵法部勒宗徒，如耶穌軍者，泰西古亦有之，如天下列 Templar 是已。⁹⁸

又或以宗教崛興，信奉既同，其眾遂合。而以戰爭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機關亦成。⁹⁹

清末民初，嚴復將「部勒」一詞與西文的 organize 會通之後，曾流行過一段時間。如李伯元(1867-1906)的《文明小史》第 42 回有：「我現在辦的這些學堂，全靠著壓制手段部勒他們，倘若他們一個個都講起平等來，不聽我的節制，這差使還能當嗎？」¹⁰⁰又如蔡元培〈歐戰後之教育問題〉：「軍國民教育重在整齊、嚴肅，尤在服從。持此主義者，常用軍法部勒學生，而尤時時以尊愛王室之道德勉勵之。」¹⁰¹1917 年林語堂在《科學》第 3 卷第 10 期發表的〈創設漢字索引制議〉一文中寫道：「百年以還，歐洲學術可云浩溥，然部勒區分一檢即得者，則索引之制之所賜也。」¹⁰²上面的第一、二個「部勒」學生的例子可能與嚴復譯詞無關，而是源於傳統語彙，第三個例子中「部勒」詞彙的用法，則較接近今日「組織」的概念。然而無論如何，「部勒」一詞也不敵日譯的「組織」，今日幾乎已完全被淘汰。

眾所周知，上文中的「社會」二字譯自英文的 society，由此衍伸出以「社會學」來翻譯 sociology。嚴復企圖以「群學」取代日本的「社會學」一詞，

⁹⁷ 嚴復，〈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總述〉，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 1，頁 175。

⁹⁸ 嚴復，〈續論教案及耶穌軍天主教之歷史〉，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 1，頁 192。

⁹⁹ 嚴復，〈政治講義〉，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 5，頁 1267。

¹⁰⁰ 李伯元，《文明小史》（台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頁 334。

¹⁰¹ 蔡元培，〈歐戰後之教育問題〉，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卷 3，頁 592。

¹⁰² 轉引自網路資源：朱立文、劉淑璋，〈林語堂先生是我國近代索引之學的開拓者〉，<http://www.cnindex.fudan.edu.cn/zgsy/2003n1/linyutang.htm> (2008/11/14)。

然此一嘗試並不成功。不過嚴復並不反對「社會」一譯語。他將甄克斯(Edward Jenks, 1861-1939)的書翻譯為《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而且在他的著作與翻譯中大量使用「社會」。這主要是因為嚴復其實是要區別「群」與「社會」，認為社會只是群的一種，是有法度規範的群。在《群學肄言》的〈譯餘贅語〉中他曾對此加以說明：「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群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¹⁰³接著嚴復就徵引中國的字書來詮釋，認為漢語「社會」的翻譯是配合西義：

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嚮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卩，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¹⁰⁴

嚴復所引的字書是東漢劉熙所撰《釋名》，原文如下：「周制九夫為井，其制似井字也，四井為邑，邑猶悒也，邑人聚會之稱也。」¹⁰⁵嚴復認為「社會」在傳統語彙指「邑人的聚會」，而「邑」即包含區域與法度的意思，因此譯文與原文是配合的，這也顯示「社會」是一個很好的翻譯。嚴復在《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政治講義》之中，都使用社會來翻譯 *society*、*social* 等字眼。¹⁰⁶ 這樣一來，嚴復確實傾向使用自創的「群學」來翻譯 *sociology*，而不用日譯的「社會學」；不過，他並不反對使用日譯的「社會」，而且在概念上將群與社會加以區隔。

¹⁰³ 嚴復，〈譯餘贅語〉，《群學肄言》，頁 8。

¹⁰⁴ 嚴復，〈譯餘贅語〉，《群學肄言》，頁 8。

¹⁰⁵ 〔漢〕劉熙，《釋名》，收入〔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八十六種》（台北：大化書局據清乾隆辛亥 56 年(1791)金谿王氏刊本影印，1979），卷 1，〈釋州國第七〉，頁 847-1。

¹⁰⁶ 嚴復從文字學的角度討論社會，對當時人有所啟發，例如劉師培在 1904 年 11 月 25-26 日的《警鐘日報》上發表〈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探討文字中所反映的社會演變，顯示劉師培對《群學肄言》與《社會通詮》等書非常熟悉。亦見王元琪，〈辛亥革命前劉師培的學術研究〉，《華夏文化》，2006 年第 1 期，頁 61。

嚴復對於自由、權利等日譯語彙，以及人權、女權等詞，都非常不滿意。¹⁰⁷在《名學淺說》中有一段按語：「復按：今新學中最足令人芒背者，莫若權利、人權、女權等名詞。以所譯與西文本義，全行乖張，而起諸不靖思想故也。」¹⁰⁸在上述的幾個詞語中，最值得深入討論的是「權利」一詞。在日文中將 right 一詞確定以「權利」來翻譯，有一個複雜的發展過程。福澤諭吉(1835-1901)將 right 譯為「通義」，但此一翻譯並未被人們所接受。日人將 right 譯為「權」、「權利」，要到 1868 年西周(1829-1897)翻譯出版《萬國公法》以後，至明治中、晚期，才逐漸地固定下來。他參閱了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的中譯本，使用「權」、「權利」來翻譯 right，而普遍為人們所接受，並由留日學生再傳回中國。¹⁰⁹然而西周同時將 power (力量)也翻譯為「權」。這顯示西周對基於自然法的 right 與基於人爲之法的 power，不加區別。直到今日，仍出現將 right 與 power 翻譯為讀音相近的「權利」與「權力」混淆的情形。¹¹⁰

嚴復不同意日人將 right 譯為「權利」，他認為這是「以霸譯王」（無論「權宜」或「權謀」都具有負面的意義），¹¹¹將西方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翻譯為一個帶有負面意義的詞，因此另行譯為「職」或「直」，如「天直」、「民直」。因為他覺得 right 在西文中也有直線、直角之意(right line 與 right angle)，而中文的「直」也有「職」的意思，兩者相互配合。不過，在翻譯與 rights 相關的詞語時，他並不重複使用單一的辭彙來翻譯這個字，而常常依據上下文來作調整。他將此一態度稱為「隨地斟酌，不必株守，……在己能達，在人能喻，

¹⁰⁷ 嚴復將日人所翻譯的「自由」改為「自繇」，因為他認為此一概念「本一乎名，非虛乃實」，見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頁 48-49。

¹⁰⁸ 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 4，頁 1055。

¹⁰⁹ 柳父章，《翻譯とはなにか——日本語と翻訳文化》（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85），頁 78。

¹¹⁰ 柳父章，《翻譯とはなにか——日本語と翻訳文化》，頁 80-81。

¹¹¹ 劉禾研究《萬國公法》的翻譯指出“right”一詞在國際法的實踐之中本來就具有「霸」的性質，這樣一來具有負面意義的「權利」一譯詞其實是配合 right 的意涵。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1.

足矣。」¹¹²例如，他將 rights and interests 合併翻譯為「權利」；有時又將 interest 翻譯為「權利」；他也把 constituted rights 翻譯為「權利」。根據筆者的考察，當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所稱的 right 表示自然權利或不可讓渡之權利時，嚴復傾向於翻譯為「天直」、「民直」；然而當 right 與 interest 合用，而具有個人利益之意涵時，他則採用「權利」。¹¹³

從以上所提到幾個例子可以顯示，嚴復在對抗東語之時，有時另鑄新詞，有時則在翻譯之中一方面利用日譯詞語，另一方面也修正日譯新名詞。然而即使是嚴復深思熟慮所翻出的「官品」、「部勒」、「直」等語，都敵不過日譯的「有機」、「組織」、「權利」。另一些類似的例子，如嚴復將 compromise (妥協)譯為「得半」，將 neuter gender (中性)譯為「罔兩」，都有其深意，卻不敵日譯。¹¹⁴再者，嚴譯的「天演」(evolution)亦為日譯的「進化」所取代，此一過程蔣英豪有詳細的研究，茲不贅述。¹¹⁵這顯示翻譯語本身的優劣似乎並無法決定它們是否會為人們所接受。

四、嚴復與譯名統一工作

上述嚴復譯詞與日譯新名詞之競爭，顯示清末翻譯名詞的混亂，以及譯名

¹¹² 嚴復，〈與梁啟超書·三〉，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3，頁518。

¹¹³ 見拙著，《自由的所以然》，頁168-169。嚴復將 right 譯為「民直」似乎沒有得到迴響。1903年《新民叢報》25期上有一篇討論翻譯問題的文章。該文作者顯然對日譯名詞不滿，尤其是將俄羅斯譯為「露」、將「德意志」譯為「獨」。他還說：「近人好用日本新名詞以自炫者，吾不解其何心矣。」然而對於嚴復的譯詞「民職」、「民直」，他還是有所保留，認為「未敢遽謂然」。見頁75。

¹¹⁴ 「罔兩」一詞最早出現在1904年嚴復出版的《英文漢詁》中，意指詞性在陰性、陽性之外，另有一範疇，「物之無牝牡陰陽可論者，別立一屬，謂之罔兩」（頁19）。嚴復在評註《莊子》時也對此有所說明，「凡物之非彼非此者，曰罔兩。魑魅罔兩，介於人鬼物魑之間者也。問景之罔兩，介乎光影明暗之間者也，此天文學者所謂暗虛者也。室中有二燈，則所成之影皆成暗虛，必兩光所不及者，乃成真影。前之罔兩，既非人鬼，又非物魑；後之罔兩，既非明光，又非暗影；此命名之義所由起也。」見嚴復，〈莊子評語〉，《嚴復集》，冊4，頁1108。筆者感謝新竹清華大學劉人鵬教授提供此一訊息。

¹¹⁵ 蔣英豪，〈晚清「天演」、「進化」二詞的消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6年第46期，頁73-89。

統一之迫切，而嚴復在這方面所做的成績也不盡理想，以致未能有效對抗東語。從中西接觸的初期，即有傳教士提出譯名統一的問題，同文館的譯學館也曾嘗試此一工作。¹¹⁶不過清政府對此問題所採取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性的努力，要屬在學部之下設立「編訂名詞館」一事。該館從 1909 年底設立，至辛亥革命方告一段落。當時的學部尚書榮慶(1859-1917)聘任嚴復擔任該館的總纂(1909-1911)。¹¹⁷名詞館的工作綱領與嚴復的權責如下：

查各種名詞不外文實兩科，大致可區六門。一曰算學。凡筆算、幾何、代數、三角、割錐、微積、簿記之屬從之。二曰博物。凡草木、鳥獸、蟲魚、生理衛生之屬從之。三曰理化。凡物理、化學、地文、地質、氣候之屬從之。四曰輿史。凡歷史、輿地、轉音譯義之屬從之。五曰教育。凡論辨、倫理、心靈教育之屬從之。六曰法政。凡憲政、法律、理財之屬從之。惟各種名詞繁曠或辨義而識其指歸，或因音而通其假借，將欲統一文典，昭示來茲，自應設立專局，遴選通才，以期集事。擬暫借臣部東偏考院，作為辦公之地，名曰編訂名詞館。即派嚴復為該館總纂，並添分纂各員，分任其事，由該總纂督率，分門編輯，按日程功。其一切名詞，將來奏定頒行之後，所有教科及參考各書，無論官編民輯，其中所用名詞有與所頒對照表歧異者，均應一律遵改，以昭畫一。¹¹⁸

在《教育雜誌》之上，也摘要刊登了上述的內容。¹¹⁹嚴復任職之後立刻著手聘請分纂，參與工作。他在寫給甥女何紉蘭的信中表示：「名詞館開辦後，尚為得手，分纂調聘亦無濫竽；惟部中諸老頗欲早觀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趨耳。」嚴復這一段期間在寫給妻子朱明麗的信中，也反覆提及工作繁重，「我在此間

¹¹⁶ 王樹槐，〈清末繙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969 年 8 月），頁 47-82。

¹¹⁷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復集》，冊 5，頁 1550。

¹¹⁸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冊 2，卷 101，〈學校八〉，頁 8601。

¹¹⁹ 〈名詞館編纂之綱領〉，《教育雜誌》，卷 1 期 11(1909)，頁 82-83。

責任頗重，且趕數月成書，故甚忙迫」；「刻須日日到部到館」。¹²⁰嚴復上文中所說的「部中諸老」應是指當時擔任學部侍郎的嚴修(1860-1929)與寶熙(1868-1930?)。館中的分纂則有：常福元、曾宗鞏、劉大猷、王國維、王用舟、高近宸、王世澄、林志琇、魏易等人。¹²¹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王國維，他不但學過歐洲語文，也通日文。此外，常福元(1874-1939)畢業於天津水師學堂，是嚴復的學生，曾任職於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辛亥革命後，任中央觀象台天文科長），擅長天文、曆算、力學等。魏易精通英文，曾任京師大學堂英文教習。庚子事變後，魏易曾在杭州協助林紓翻譯《民種學》〔*Ethnology*，德國哈伯蘭(Michael Haberlandt, 1860-1940)原著、英國魯威原譯〕、《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與莎士比亞的作品等。由此可見，這些分纂顯然都不是濫竽充數之輩。嚴復甚至還想要網羅他的學生伍光建(1866-1943)來名詞館任職，可惜伍光建有所顧慮，未能應聘。¹²²

嚴復在此期間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編纂《國民必讀》，從1909年12月21日開始，至1910年2月5日完成，共7卷。該書的目的是普及教育，供貧民與失學之人閱讀。除了這一套書之外，學部同時還編輯了《簡易識字課本》，以應預備立憲期間國民教育之需。至1910年學部的「編譯圖書局」與名詞館共同完成了統一規範教科書中的名詞，並完成了算術、生物、物理、化學、地理、心理、憲法等科的教科書，還公布了各學科中外名詞對照表。¹²³1911年3月26日，《申報》有一則「學部新編各種教科書」的廣告，除了有修身、國文、算術、格致各科的「教科書」與「教授書」之外，還有嚴復所編輯的《簡易國民必讀課本》。

嚴復所負責的名詞統一工作，顯然成果並不令人滿意，他只進行了初步的工作，而無法達到上述綱領所要求的「奏定頒行之後，……一律遵改，以昭畫

¹²⁰ 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344-345。

¹²¹ 皮后鋒，《嚴復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365。

¹²² 皮后鋒，《嚴復大傳》，頁363。

¹²³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379。

一」。在這期間民間的出版社亦發現專門學科的語彙辭典具有高度的市場價值。這時出版的書籍包括：錢恂、董鴻禕編的《日本法規解字》(1907)、商務印書館編《物理學語彙》(1908)、《漢譯日本法律經濟辭典》(1909)等。¹²⁴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套書要屬由東吳大學漢文教習黃人(摩西)編輯、上海國學扶輪社於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¹²⁵

這一套書共15冊，全書「一百數十萬言」，¹²⁶收集詞條11,865條，據統計，其中僅5,500條屬於社會科學方面，其他部份則為科學與技術方面的詞彙，¹²⁷全書依照筆畫排列，並附分科索引。該書〈凡例〉中的數條對全書宗旨有簡要說明：

本書蒐輯一切學語，調查種種專門學書籍為基礎，中外兼賅，百科並蓄，以適用於教員考檢，學子自修為宗旨。

一切學語以學部鑒定者為主，餘則取通行最廣者。

吾國新名詞大半由日本過渡輸入，然所用漢字，有與吾國習用者相同而義實懸殊者，又有吾渾而彼畫，易涉疑似者，皆隨條分析。¹²⁸

該書卷首有編者黃人的自序，以及嚴復所寫的序言。我們不清楚國學扶輪社與嚴復的關係，不過如上所述，該社曾出版《林巖合鈔》，可能與嚴復曾有接觸，至少雙方對提倡國學與翻譯詞統一的問題立場相近。然而這一套書會由嚴復作序，主要還是因為他當時負責編訂名詞館的工作。嚴復在序中對於該書表示讚許，認為可以「豐佐吾事」而「裨補教育」，因而欣然為之作序。¹²⁹當然我們對照上述凡例所言「一切學語以學部鑒定者為主」，也顯示該書主動地配合學

¹²⁴ 王樹槐，〈清末繙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頁67-68。

¹²⁵ 有關黃人的生平，見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有關《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則見：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收入陳平原、米列娜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35-154。

¹²⁶ 黃摩西，〈序〉，《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2。

¹²⁷ 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44期2（2007年3月），頁65。

¹²⁸ 黃摩西，〈凡例〉，《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1。

¹²⁹ 嚴復，〈序〉，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頁1-5。

部編訂名詞館的工作方向。

這一套書的市場反應頗佳。在《時報》1911年5月1、7、14、17等日之上有該書的兩則廣告，一則表示「普通百大辭典准五月二十日出版」，另一則是「預約截止廣告」，表示該書該書定價8元，預約七折，目前預約狀況踴躍，已超過9,200冊，並將於出書前三日停止優惠：

本書搜羅豐富、體例完密、解釋精當、引證詳確，圖表均屬，應有盡有。洵參考之大全書。教員試驗，學子自修，尤為切用。……預約二次，售去九千二百餘部，所存無多。准予出書前三日截止。¹³⁰

以上的廣告或有誇大之處，不過該書在1911年5月問世、6月再版、7月三版，當年冬天更預備出第四版，加印三千冊。該社接著還出版了《文科大辭典》，¹³¹由此可見出版此類書籍確實有利可圖。這大概是民間出版機構比學部更積極編輯此類書刊的根本原因。

不少的學者都認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所收錄新知識用語主要採取日本新名詞，並刊載大量日本所翻譯的地名和人名，這主要是因為編者所依賴的參考書籍大多數是日文書與日譯本。¹³²這一個觀察是正確的。那麼在這一套由嚴復作序的辭典中，嚴復的譯語究竟保留了多少？根據筆者的考察，編者絕大部份都採取日譯詞彙，而放棄嚴譯。例如書中收錄了「神經」、「星雲」、「單位」、「權利」、「銀行」、「望遠鏡」、「社會學」、「人類學」、「進化論」、「有機體」等等。如上所述「神經」之下附了早期的譯語「腦氣筋」，卻沒有「涅伏」。不過也有一些詞語附了嚴復譯語，例如，在「三段論法」之下附了「聯珠」；在「人為淘汰」之下附了「擇種留良」；「論理學」之下附了「名學」；「經濟學」之下附了「計學」。在書中所收錄的一萬多詞條中，嚴復譯語被採取作為主條目者僅有：「天擇物競」、「適者生存」、「內籛」

¹³⁰ 《時報》，1911年5月1日，第1版。

¹³¹ 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44期2，頁73。

¹³²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212。

（後附「歸納」）與「外籀」（後附「演繹」）。不過上述四個嚴譯條目中，「內籀」與「外籀」最後還是被日譯所取代，這樣一來《天演論》中的「天擇物競」、「適者生存」是僅存的詞條。這反映了嚴復譯語在清末「新名詞之戰」中的結局。

五、結 語

清末的新名詞之戰到民國初年之後已逐漸銷聲匿跡，日譯新名詞取得了絕對的勝利，由嚴復作序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一書，即標誌著嚴復的挫敗與日譯的成功。今日少有國人會意識到「團體」、「組織」、「膨脹」、「舞臺」、「代表」等詞彙是從日文來的。《荀子·正名篇》曾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¹³³上文中所謂「約定俗成」大致上可以解釋日譯的成功。這些新名詞尤其表現在在大眾傳播媒體（各種報刊）、翻譯書籍、教科書、百科辭典等出版品之中，隨著新知識的傳播大量出現，又創造出上游字、下游字結合成的語彙體系，因而發揮了鋪天蓋地的影響力。相對來說，嚴復的翻譯作品只佔了出版市場之中很小的一塊，再加上在大眾傳媒方面，嚴復在清末經營《國聞報》失敗之後，即不再涉足報刊市場，最後只好在語言戰爭中敗下陣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荀子還有「名有固善」的觀點。對他而言，語言文字的創造仍存在一個絕對的標準，只不過「名」的好壞與其是否能「約定俗成」，並無必然的關係，名詞翻譯亦可作如是觀。嚴復非常努力地創造「徑易而不拂」（簡單明瞭而又不矛盾）的「善名」。他很清楚地意識到譯名要有文字學的基礎，並奠定在譯者對翻譯雙方（所謂的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文化背景的深刻認識之上，亦即一方面應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臘文或拉丁文中的原意，另一方面要尋找在中國文字學上有來歷的適當名詞來

¹³³ 查索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2008/11/14)。

翻譯西字，並細查其兩方詞彙的文化與思想背景。嚴復所創造的譯語，如以「烏託邦」翻譯 Utopia、以「智環」翻譯 encyclopedia，以及以「民直」來譯 right，都是很好的例子。很可惜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嚴譯名詞未能更廣泛地為人們所採納，然而他所揭櫫「信、達、雅」的理想，無疑地值得我們繼續追求。¹³⁴

¹³⁴ 據筆者所見，嚴復之後僅賀麟在翻譯西方哲學著作時跟著嚴復的思路，一方面「鄭重訂定譯名」，主張翻譯名詞要有文字學與哲學史的基礎，另一方面認為「對於日本名詞，須取嚴格批判態度，不可隨便採納，……徐圖從東洋名詞裡解放出來」。賀麟，〈譯序〉，魯一士著，賀麟譯，《黑格爾學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29-30。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今日新黨之利用新名詞〉，《東方雜誌》，卷1期11，1904，頁75-76。
- 〈方言學堂歷史教師之優劣〉，《警鐘日報》，1904年9月16日，第2板。
- 〈名詞館編纂之綱領〉，《教育雜誌》，卷1期11，1909，頁82-83。
- 〈兩湖總督張札設存古學堂文〉，《東方雜誌》，卷2期1，1905。
- 〈師範學堂笑柄〉，《警鐘日報》，1904年9月16日，第2板。
- 〈新名詞被黜〉，《警鐘日報》，1904年9月17日，第2板。
- 〈新定學務綱要〉，《東方雜誌》，卷1期3，1904。
- 〈新釋名〉，《新民叢報》，1904年第50號。
- 〈廣東舉人陳景華等呈文〉，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 〈論今日舊黨之用新名詞〉，《警鐘日報》，1904年10月17日，第1板。
- 〈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東方雜誌》，卷3期12，1906，頁239-240。
- 《時報》，1911年5月1日，第1版。
- 《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 《商君書》，〈徠民第十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 〔唐〕李延壽，《北史》，卷9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冊2，卷101，〈學校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第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 〔漢〕劉熙撰，《釋名》，〈釋州國第七〉，收入〔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八十六種》，卷1。台北：大化書局據清乾隆辛亥56年(1791)金谿王氏刊本影印，1979。
- 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靜庵文集》，收入《王國維遺書》，冊5。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 王爾敏，《水手的話》。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7。
-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
- 江庸，《趨庭隨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

- 伯倫知理著，吾妻兵治譯，《國家學》。東京：善鄰譯書館，1899。
- 伯倫知理著，梁啓超譯，〈國家論卷一〉，《清議報》，1899年第15期。
- 李伯元，《文明小史》。台北：廣雅出版公司，1984。
- 汪康年，〈以愛力轉國運說〉，《時務報》，1896，冊12。
- 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上海：明權社，1903。
- 亞當·斯密著，嚴復譯，《原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6。
-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 馬建忠，《馬氏文通》。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高鳳謙，〈論保存國粹〉，《教育雜誌》，卷1期7，1909。
- 張達驥、李石孫，〈張之洞事蹟述聞〉，《文史資料精選》，冊1。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中華書局，1974。
- 梁啓超，《新大陸遊記》。台北：藝文印書館據光緒29年(1903)新民叢報臨時增刊編印本影印，1966。
- 梁啓超，《新民說》。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
-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書局，1978。
- 郭沫若，《少年時代》，收入《沫若自傳》，卷1。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
- 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安主編，《章士釗全集》，冊2。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 章士釗編，《中等國文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據清光緒17年(1891)上海著易堂鉛印本，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2006。
- 賀麟，〈譯序〉，魯一士著、賀麟譯，《黑格爾學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 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
- 黃遵憲，〈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新民叢報》，1903年第24號。
- 葉德輝，〈葉吏部長興學記駁義〉，收入〔清〕蘇輿編，《翼教叢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 甄克斯原著，嚴復譯述，《社會通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 赫施賚著，羅亨利、〔清〕瞿昂來譯，《格致小引》。上海：清江南製造總局排印本，1886。
-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劉師培，〈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警鐘日報》，1904年11月25-26日，第1、2板。
- 劉師培，《倫理教科書》，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下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寧南武氏1936年排印本重印，1997。
- 劉復著，瘳弦編，《劉半農文選》。台北：洪範書局，1978。
- 蔡元培，〈歐戰後之教育問題〉，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卷3。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魯迅，〈序言〉，《集外集》，收入《魯迅全集》，卷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 魯迅，〈憶劉半農君〉，《且介亭雜文》，收入《魯迅全集》，卷6。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 魯迅，〈難得糊塗〉，《准風月談》，收入《魯迅全集》，卷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 穆勒著，嚴復譯，《群己權界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 穆勒著，嚴復譯，《穆勒名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 嚴復，《英文漢詁》。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
- 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1-5。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嚴復著，王慶成等編，《嚴復合集》，冊5、10。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
- 嗶嘰子，〈林嚴合鈔序〉，《林嚴合鈔》。上海：國學扶輪社，1909。
- Huxley, Thomas Henr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c.1901.

二、專書

- 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 王爾敏，《橋乘小品》。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
- 皮后鋒，《嚴復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李運博，《中日近代詞彙的交流——梁啟超的作用與影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辭典》。香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 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7。
- 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
- 馮天瑜、劉建輝、聶長順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 沈國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東京：笠間書院，1994。
- 沈國威編，《漢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神戸：關西大學出版部，2008。
- 柳父章，《翻譯とはなにか——日本語と翻譯文化》。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5。
- Bonner, Joey.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Liu, Lydia H. *The Clash of Empire: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三、論文

王中江，〈中日文化關係的一個側面——從嚴譯術語到日譯術語的轉換及其緣由〉，《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頁141-154。

王元琪，〈辛亥革命前劉師培的學術研究〉，《華夏文化》，2006年第1期，頁61-63。

王道還，〈《天演論》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2005年12月12日。

王樹槐，〈清末繙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1969年8月，頁47-82。

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收入陳平原、米列娜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吳建林，〈論嚴復於《原富》內經濟類名詞之翻譯手法及其所譯名詞之消亡〉。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沈國威，〈關於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錄》〉，《或問》，2004年第8號，頁155-160。

都重萬，〈嚴復對劉師培學術思想及《國粹學報》學術宗旨之影響〉，收入習近平編，《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44期2，2007年3月，頁59-74。

黃興濤，〈日本人與和製漢字新詞在晚清中國的傳播〉，《尋根》，2006年第4期，頁41-46。

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於「一般思想史」之認識〉，《開放時代》，2003年第4期，頁70-82。

鄒振環，〈翻譯大師筆下的英文文法書——嚴復與《英文漢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頁51-60。

蔣英豪，〈晚清「天演」、「進化」二詞的消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6年第46期，頁73-89。

鍾少華，〈清末中國人對於「哲學」的追求〉，《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2期2，1992，頁159-189。

羅志田，〈抵制東瀛文體：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57-74。

羅志田，〈溫故知新：民間的古學復興與官方的存古學堂〉，《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Kurtz, Joachim. "Coming to Terms with 'Logic': The Naturalization of an Occidental Notion in China."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Leiden: Brill, 2001.

四、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朱立文、劉淑瑋，〈林語堂先生是我國近代索引之學的開拓者〉，<http://www.cnindex.fudan.edu.cn/zgsy/2003n1/linyutang.htm> (2008/11/14)。

黃河清，〈神經考源〉，<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huangheqing/hhq04.htm> (2008/11/24)。

The War of Neologism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ewly Translated Terms Invented by Yan Fu an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Late Qing

Max K. W. Hua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many newly translated Chinese terms invented by the Japanese were imported into China with tremendous cultural effect. Facing this terminological invasion, Chinese officials, scholars, and students such as Zhang Zhidong, Yan Fu, Lin Shu, Zhang Binglin, and Peng Wenzu harshly criticized the new vocabulary. Moreover, some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the famous translator Yan Fu, created new terms to replace the Japanese neologisms. This gave rise to a competition that lasted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Yet by the 1920s, most of the terms that had originated in Japan had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expense of the terms created by Yan and other Chines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mpetition and discusses the abandoned neologisms invented by Yan Fu. These terms included transliterated terms such as “tuodu” (拓都, total), “yaoni” (么匿, unit), “niefu” (涅伏, nerve), “luoji” (邏輯, logic), “wutuobang” (烏託邦, utopia), as well as newly invented translations such as “guanpin” (官品, organic), “bule” (部勒, organization), “qunxue” (群學, sociology), “mingxue” (名學, logic), and “tianzhi” and “minzhi” (天直、民直, rights).

Most of the terms invented by Yan gave way to Japanese neologisms. The failure of Yan’s own neologisms was also seen in his failure to unify translated terms when he was the head of the Offi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ranslated Terms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erms invented by Yan and by the Japanese indicates that Xun Zi's view on "the correct use of names" is still insightful. Xun Zi noted, "Names have no intrinsic 'appropriateness.' They are bound to something by agreement in order to name it. The agreement becomes fixed, the custom is established, and it is called 'appropriate.'.... Names do not have intrinsic good qualities. When a name is direct, easy, and not at odd with the thing, it is called a 'good name.'" There were some "good names" in Yan's translations, but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not fixed by public agreement. Nevertheless, his ways of creating new terms revealed proper standards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Yan Fu, Zhang Zhidong, Japanese neologisms, Offi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ranslated Terms